

环境污染、公益性捐赠与“清洁”审计意见 ——来自中国 A 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吴良海¹,张玉¹,吕丹丽¹,谢志华²

(1. 安徽工业大学 商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32;2. 北京工商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0048)

[摘要]选取 2008—2015 年间沪深 A 股市场 9960 个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作为样本,对环境污染、公益性捐赠与“清洁”审计意见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公益性捐赠行为能够增加审计师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2)区分企业环境污染程度后发现,相比于非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的公益性捐赠获得“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相对较低;(3)区分企业产权性质的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公益性捐赠获得“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没有实质性差异。

[关键词]环境污染;公益性捐赠;“清洁”审计意见;产权性质;企业社会责任;审计费用;盈余管理;审计风险

[中图分类号]F239.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17)06-0031-12

一、引言

近年来,受“毒奶粉”事件影响,国人对国产奶粉产生了信任危机,从而热衷抢购国外奶粉,造成国外奶粉荒。“毒奶粉”企业一味追求利润,丧失基本道德与社会责任,这无疑是杀鸡取卵,“上帝”终将远离他们。当然,这些害群之马只是少数,大多数企业都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据统计,我国社会公益性捐赠总额的 70% 以上来自企业,大到国家灾难(例如“5·12”汶川地震、洪涝雪灾),小到生活点点滴滴(例如助学扶贫,关爱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不一而足。传统观念中,企业是对利润趋之若鹜的逐利者,从不做亏本的买卖。那么,是什么原因让逐利企业慷慨解囊,公益性捐赠究竟能给企业带来怎样的利益?

钟宏武认为,企业进行公益性捐赠就相当于间接地购买了保险,企业通过捐赠能避免外界对它的潜在伤害^[1]。韩丽荣等认为,注册会计师在审计的过程中关注了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情况^[2]。韩文才和汤琦瑾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能有效降低企业风险,从而降低审计师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可能性^[3]。在我国,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企业公益性捐赠行为的实施是否影响审计师最终出具的审计意见?本文选取我国 2008—2015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试图探讨企业公益性捐赠与“清洁”审计意见之间相互作用的机理与效应。

近年来,我国各类环境事故频发:2007 年太湖蓝藻污染事件,让人谈“藻”色变;2009 年,儿童血铅超标事件沸沸扬扬,重金属污染企业难辞其咎;2013 年,“雾霾”一跃成为热点词,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排行榜中,中国占了七席;2016 年,常州“毒跑道”事件引发社会热议。每况愈下的生存环境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警觉,人们日益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环保也被提上了国家发展的日

[收稿日期]2016-12-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JY01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4AJY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4ZDA02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02001)

[作者简介]吴良海(1970—),男,安徽桐城人,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从事会计与投资者保护研究;张玉(1993—),女,安徽安庆人,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会计与投资者保护研究;吕丹丽(1992—),女,江苏镇江人,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会计与投资者保护研究;谢志华(1959—),男,湖南益阳人,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审计与财务理论研究。

程。“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作为污染环境恶瘤的重污染企业,不可否认它曾为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毋庸讳言,重污染企业对整个社会环境的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社会舆论普遍认为,重污染企业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更应通过公益性捐赠等形式,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环境的综合治理当中,弥补自身生产运营给周边环境造成的污染破坏。企业环境污染问题已然引起了学术界与实务界的高度关注。本文依据环境污染程度,将企业划分为重污染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进一步探究不同污染程度的企业进行公益性捐赠时获得“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二、文献综述

在国外发达国家中,公益性捐赠逐渐成为企业向大众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主要手段。在国内,迟爱敏和张东玲认为,企业公益性捐赠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一种必然,现代中国企业具备公益性捐赠的能力,也应当向社会给予回馈^[4]。伴随着整个社会对企业公益性捐赠的重视和企业公益性捐赠行为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国内外学者的目光纷纷聚焦于企业公益性捐赠行为上,关于企业公益性捐赠的研究日益兴起。Navarro 指出,企业公益性捐赠通过抵税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5]。Brammer 和 Millington 实证发现,企业声誉与公益性捐赠额密切相关^[6]。杜兴强和杜颖洁用是否捐赠、是否积极捐赠以及捐赠额大小三个指标度量企业公益性捐赠,并验证了公益性捐赠与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的正相关关系^[7]。李诗田和宋献中证实,企业重视声誉的程度与其公益性捐赠水平显著正相关^[8]。然而,Windsor 认为大多数股东投资都是投机行为,捐赠短期内会降低企业价值,因此他们并不看好企业的公益性捐赠行为^[9]。牛海鹏和朱松研究发现,企业的公益性捐赠行为并不被当下的中国市场所认可^[10]。由上述不难看出,国内外学者对企业公益性捐赠进行了诸多研究,但是对于企业公益性捐赠是否对企业有利尚无定论,基于审计师视角的企业公益性捐赠研究较少,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契机。

目前,学术界主要从客户特征、会计师事务所特征和其他外部因素三个方面对审计意见展开研究。DeAngelo 认为,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出具主要考虑两个因素,即审计师的能力与独立性^[11]。Palmrose 认为,由于法律诉讼的存在,审计师更易对财务风险较大的公司出具“不清洁”的审计意见^[12]。吴腊发现,审计费用对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意见具有重大影响^[13]。李歆和左燕实证检验出盈余管理程度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正相关关系^[14]。李嘉明和杨帆考察了公司对外担保的情况,发现担保风险越高的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也越大^[15]。遗憾的是,从社会责任角度出发,研究企业公益性捐赠与审计意见作用机理与效应的文献寥寥。韩文才和汤琦瑾认为,作为非财务信息的社会责任有助于提高信息透明度,从而降低审计师出具不恰当审计意见的风险^[3],但它尚未深入到社会责任的具体层面。因此,本文试图研究公益性捐赠与审计意见的关系,将社会责任与审计意见关系的研究进一步细化至社会责任中公益性捐赠这一具体层面。

近年来,G20 五个理念中的“绿色”深入人心,但是从环境污染角度出发,研究企业公益性捐赠行为的文献屈指可数。总结现有文献,我们可以发现企业公益性捐赠动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基于盈利的经济动机。Campbell 认为企业公益性捐赠能获取诸如声誉资本等战略性资源^[16]。公益性捐赠还有助于降低各项成本,例如资本成本^[17]。(2)利他性的道德伦理动机。张同龙通过大样本调查,证实中国企业的公益性捐赠行为具有显著的利他动机^[18]。(3)争取有利外部环境的政治和制度动机。在中国特色的制度背景下,钟宏武认为中国企业公益性捐赠普遍具有向政府寻租的动机^[1]。李胜楠等认为,受我国资源分配方式影响,政治关联在我国企业中的影响较为典型^[19]。(4)声誉动机。Godfrey 认为,企业通过公益性捐赠来掩盖企业其他不当行为或者转移公众对企业内在社会责任缺失的关注,从而降低企业的声誉损失^[20]。虽然高勇强等发现,企业环保投入越多,越乐于进行公益性捐赠^[21],强有力地验证了企业环保与公益性捐赠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它并未从环境污染角度考虑。重污染企业具有较强的环境负外部性,其进行公益性捐赠的经济后果与非重污染企业存在差异。此

外,企业的行业环境对于企业战略的选择与实施至关重要,其公益性捐赠的决策及行为也不可避免地受此影响。综上考虑,本文试图从企业环境污染和审计师意见的双重视角解读企业公益性捐赠的经济后果,丰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文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清洁”审计意见是指未加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即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无保留加说明段、保留意见、拒绝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均为“不清洁”的审计意见。审计意见的“清洁”度受审计师与被审单位两方面影响。对于被审计单位而言,除了财务报表等信息外,更多的表外信息也是审计师观察企业经营状况等的重要参考。对于审计师而言,其本身具有主观能动性,某种程度上有善恶偏好、风险偏好等,因此在审计过程中,企业经营状况、公众形象、审计风险等也将影响审计师审计意见的出具。

老子曰“将欲夺之,必固予之”,它阐述的是“先舍再得”的思想,即只有懂得舍弃才能得到。很多企业也将“舍得”观融入企业的价值观中。此外,包括儒家、道家和佛教等在内的很多学派,它们的核心思想中也都存在着浓厚的慈善观,这对现代企业有着重要影响。企业通过公益性捐赠造福社会,也是慈善观的一种体现,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价值要求。根据传统思想中善有善报等人伦伦理思想,企业如果乐施行善,富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那么包括审计师在内的社会各界都将会对它产生信任,在各方面给予它优待。审计师在出具审计意见的时候不仅关注表内信息,也越来越重视表外所隐含的信息。一个企业乐于捐赠,向社会公众传递正面积极的形象。面对这样富有责任心的企业,作为带有主观能动性的审计师,他无疑对这类企业更加信任,甚至具有好感,这种好感在审计时表现为审计师更加愿意相信捐赠企业出现重大差错甚至财务作假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审计师对乐于捐赠的企业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更高。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是利益相关者的连接或者契合体。利益相关者是指对企业的活动享有所有权、使用权或者控制权的个人或群体,他们都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注入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同时也分担了企业一定的经营风险或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作为出具审计意见的审计师,由于承担了对公司财务信息提供合理保证的责任,因此,也应该划入利益相关者的范畴。此外,委托代理中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将使得审计人员不轻易出具“清洁”审计意见。审计人员出具审计意见时将综合参考被审计企业各方面的信息,包括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从而降低自己应当承受的道德风险,规避审计失败。

博弈论也进一步解释了审计人员出具审计意见时的多方博弈心理。在现代风险导向型审计下,审计师在出具审计意见时会充分考虑审计失败风险,以便将其降低到自身可承受的范围内,作用机理在于:一方面,从财务风险角度出发,信号传递理论认为社会责任的履行传递了企业信息透明的信号,能降低企业财务风险,从而使审计失败的概率变小^[22];另一方面,从监管风险角度出发,韩文才和汤琦瑾认为,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被监管调查的可能性较低,面临的诉讼少于一般企业,这就间接降低了审计风险^[3]。因此,公益性捐赠作为一个能充分体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指标,能够降低企业的风险水平,进而降低审计师的审计风险。因为,一般而言,审计风险变小,审计师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会相应增大。

声誉被定义为企业对它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综合吸引力^[23],换言之,企业声誉就是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品牌、形象的总体感知与评价,它是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可以间接向外界传递信息。乐于并且有能力进行公益性捐赠的企业,间接地向社会公众传递了这家企业经营状况与公司治理较好的信息。同时,企业进行公益性捐赠属于对社会的回馈,是正面积极的行为,能够获得社会公众认可,从而形成公司的声誉资本,最终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杜兴强和杜颖洁基于突发事件——汶川地震,搜集地震后各企业公益性捐赠的数据,证实了捐赠和会计业绩与市场业绩的正相关关系^[7]。郑志刚等通过比较捐赠与不捐赠的企业,发现参与捐赠企业在资本市场获得了较为正面的市场反应^[24]。可见,

一个乐于捐赠的企业,能获得经济效应和无形资本,使其经营状况趋于良好。此外,根据陈丽蓉和潘芹的研究,企业财务状况越差,越有可能被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25]。既然公益性捐赠能够显著改善自身会计绩效,而会计绩效与“清洁”审计意见正相关,因此,我们可以推论,企业公益性捐赠能够影响审计意见的“清洁度”。

根据伤害保险理论,企业的公益性捐赠具有一定的保险功能。Godfrey 的伤害保险模型阐明了公益性捐赠的保险作用机制^[20]。江炎骏也曾提到企业公益性捐赠的伤害保险价值与捐赠金额有关,金额越大,价值越大^[26]。因此,在企业遭遇意外情况,导致声誉受损甚至影响审计意见时,公益性捐赠的伤害保险作用就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伤害程度。公益性捐赠的伤害保险功能会增大审计师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另外,按照常理,一个盈利能力强、经营状况好的企业,可以通过公益性捐赠行为,向外界展示其良好的经营管理质量与充沛的流动资金,粉饰自身报表的动机较弱,因此,其获得“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相应较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说。

假说 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公益性捐赠行为能够增加审计师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

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已经严重危害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社会公众对于环境污染深恶痛绝。重污染企业因其经营特点,普遍被认为是破坏环境的首要因素。因此,社会公众对它们有着深深的抵触情绪。例如,2002 年河南焦作迁出“污染大户”——中州碳素厂,群众好评如潮;2007 年江苏启东群众通过游行抵制南通王子造纸厂污染家乡等。在社会公众形象方面,重污染企业较非重污染企业明显不具有竞争优势,社会公众更加偏爱环保的企业。根据心理学中的马太效应,即“好的愈好,坏的愈坏”,非重污染企业由于它本身在社会公众心目中就具有良好的形象,其公益性捐赠无异于“锦上添花”,可以获得社会公众的高度认可,审计师可能因为对它有好的印象,更加信任它,出具的审计意见更偏向于“清洁”。而重污染企业,由于它对环境的破坏,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社会公众对它产生了坏印象。此时重污染企业进行的公益性捐赠,虽然能起到一定的伤害保险作用^[26],得到社会公众的好评,但是要想完全扭转它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坏形象,似乎有些不太现实。因为根据思维定式效应,社会公众在与企业长期交往和博弈的过程中,已经形成对各类企业的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将影响社会公众对企业各类行为的价值判断和信任程度。相较于非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长期不被社会公众认可,审计师对其公益性捐赠的信任程度偏低,可能认为其捐赠行为带有某种不良动机,比如掩盖污染环境的丑闻。由于较非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的公益性捐赠动机相对不单纯,因此重污染企业传递的“好”信息往往存在瑕疵。而审计师通常只能看到传递的信息,无法得知企业捐赠的真正动机。在这种情况下,审计师虽对于重污染企业的公益性捐赠行为认可并有好感,但这种好感度比起非重污染企业而言打了折扣,因此重污染企业通过公益性捐赠行为获得“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远比非重污染企业低。

此外,重污染企业的行为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外部性指的是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的经济现象。重污染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对环境造成了污染,给社会公众造成了损害,整个社会为它的污染买单。当重污染企业进行公益性捐赠时,社会公众虽认可其捐赠行为,但对它的认可度远低于非重污染企业,甚至部分人认为重污染企业本身就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来弥补它给社会公众所带来的负外部性。重污染企业较非重污染企业,其公益性捐赠更是理所应当的,是一种补偿^[27]。在这种情况下,重污染企业的公益性捐赠虽然发挥了一定的声誉作用,但其所发挥的声誉机制较非重污染企业大大减弱。因此,相比于非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的公益性捐赠获得“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较低。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说。

假说 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比于非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的公益性捐赠获得“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较低。

四、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8—2015年沪深A股所有上市公司数据作为初始样本,按研究惯例剔除了以下公司样本:①金融保险业公司;②数据缺失的公司;③ST、PT公司和退市公司。本文最终得到9960个研究样本。为控制离群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对回归模型连续型变量在5%和95%分位数处进行了缩尾(WINSORIZE)处理。最终控制人数据取自色诺芬&CCER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库,企业公益性捐赠及其他企业相关原始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本文基于Excel2010和Stata13进行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二) 研究模型和变量定义

本文主要研究企业公益性捐赠与“清洁”审计意见的关系,进行了以下实证研究:一是检验企业公益性捐赠额对“清洁”审计意见的影响;二是依据企业环境污染程度将企业划分为重污染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检验环境污染对公益性捐赠与“清洁”审计意见关系的影响。据此,本文建立以下两个模型进行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一:

$$op = \alpha_0 + \alpha_1 \ln donation + \alpha_2 \ln size + \alpha_3 lev + \alpha_4 roe + \alpha_5 idr + \alpha_6 \ln salary + \alpha_7 opl + \alpha_8 dual + \alpha_9 Q + \alpha_{10} aufirmc + \alpha_{11} soe + \eta$$

模型二:

$$op = \beta_0 + \beta_1 \ln donation + \beta_2 pollution + \beta_3 pollu_ln donation + \beta_4 \ln size + \beta_5 lev + \beta_6 roe + \beta_7 idr + \beta_8 \ln salary + \beta_9 opl + \beta_{10} dual + \beta_{11} Q + \beta_{12} aufirmc + \beta_{13} soe + \varepsilon$$

模型一用于观测公益性捐赠与“清洁”审计意见的关系,检验假说1;模型二用于观测环境污染对公益性捐赠与“清洁”审计意见关系的影响,检验假说2。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清洁”审计意见(*op*)。模型中“清洁”审计意见是指未加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即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无保留加说明段、保留意见、拒绝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均为“不清洁”审计意见。当客户收到“清洁”审计意见时,*op*为1;反之,则为0。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企业公益性捐赠(*Indonation*)。学术界对于公益性捐赠额的测度主要采取两种方法,即绝对指标测量和相对指标测量。本文借鉴相关文献^[7],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测量企业公益性捐赠,包括:(1)企业公益性捐赠金额的大小*Indonation*。我们将年报中所披露的企业公益性捐赠额取对数,作为公益性捐赠金额的测量,若年报中公益性捐赠额为0及未披露公益性捐赠额,则取值为0。(2)企业是否进行公益性捐赠(*dond*)。企业参与公益性捐赠则取值为1,否则为0。若年报中公益性捐赠额为0及未披露公益性捐赠额,取值为0。(3)企业公益性捐赠规模(*d*)。*d*为*Indonation/lnsize*,是表达公益性捐赠强度的连续性变量(定距变量)。其中*Indonation*为企业年报中所披露的企业公益性捐赠额的自然对数,*lnsize*为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蔡春等认为影响上市公司审计意见的因素分为两类:一是上市公司内部管理质量,二是会计师事务所规模^[28]。据此,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①净资产收益率(*roe*)。本文用净资产收益率来衡量企业盈利能力。一般认为企业盈利能力越强,审计意见“清洁”的可能性越大。本文预计净资产收益率与“清洁”审计意见正相关。②公司治理结构。本文用高管前三名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lnsalary*)、独立董事比例(*idr*)及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dual*)来衡量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越完善,审计师越可能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高管的薪酬水平越高,公司治理结构相对越完善,企业获得“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越大。我们预计公司治理结构与“清洁”审计意见正相关。③公司成长能力(*Q*)。④企业规模(*lnsize*)。一般认为企业规模越大,公益性

捐赠数额越多。本文预计企业规模与“清洁”审计意见正相关。⑤财务杠杆(*lev*)。企业财务杠杆越高,审计师出于谨慎起见越容易出具不“清洁”审计意见,本文预计两者负相关。⑥事务所变更(*aufirmc*)。李东平等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与前一年度的非标准审计意见正相关^[29]。本文预计变更与“清洁”审计意见负相关。⑦上一年审计意见(*opl*)。李伟认为审计师决策存在锚定效应,这种效应会致使审计师出具审计意见时受上期审计结果影响^[30]。本文预计企业上年被出具“不清洁”审计意见,当年仍被出具“不清洁”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将加大。⑧产权性质(*soe*)。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表1 Logistic 回归模型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清洁”审计意见	<i>op</i>	若企业审计意见为“清洁”审计意见,则取值为1,否则为0
公益性捐赠	<i>Indonation</i>	企业当年公益性捐赠额的自然对数,若公益性捐赠额为0或缺失值,则取值为0
环境污染	<i>pollution</i>	根据2010年《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 ^① 中对重污染行业的规定,将样本公司划分为两类,若企业属于重污染行业,则取值为1,否则为0
交乘项	<i>pollu_Indonation</i>	<i>pollution</i> 与 <i>Indonation</i> 的交乘项
	<i>Q</i>	托宾 <i>Q</i> ,等于公司市值/资产总计
	<i>roe</i>	净资产收益率,等于净利润/股东权益平均余额,其中股东权益平均余额=(股东权益期末余额+股东权益期初余额)/2
	<i>lev</i>	企业财务杠杆,等于(净利润+所得税费用+财务费用)/(净利润+所得税费用)
	<i>Insize</i>	企业规模,等于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i>dual</i>	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若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取值为1,否则为0
	<i>idr</i>	独立董事比例,等于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
	<i>Insalary</i>	高管薪酬,等于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
	<i>aufirmc</i>	是否发生审计事务所变更,若审计事务所发生变更,则取值1,否则为0
	<i>opl</i>	“清洁”审计意见变量的一期滞后
	<i>soe</i>	最终控制人性质,若企业是国有企业,则取值为1,否则为0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 回归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回归模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根据表2,*op*的均值为0.9438,说明有接近95%的审计意见为“清洁”审计意见,仅仅6%不到的审计意见为“不清洁”审计意见。*Indonation*的平均值为1.444,最小值、最大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15.36和4.226,说明我国企业间的公益性捐赠水平存在明显差异。*pollution*的均值为0.4199,中位数为0,说明半数以上的企业是非重污染企业。*soe*的均值为0.6182,说明61.82%的样本公司是国有企业。*dual*的均值为0.8614,说明86.14%的样本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都是两职分离的。

(二) 相关系数表

表3报告了回归模型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囿于篇幅限制,表3仅报告了回归模型主要变量之间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pearson和spearman单变量相关检验表明,公益性捐赠(*Indonation*)与被解释变量(*op*)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初步支持了假说1。

(三) Logistic 多元回归分析

表4中,M1的回归结果显示公益性捐赠*Indonation*与“清洁”审计意见(*op*)呈正相关关系,并在10%统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公益性捐赠与“清洁”审计意见显著正相关,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假说1。我们进一步对产权性质分组后发现,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的公益性捐赠对“清洁”审计意见均呈现正相关关系,但统计上不显著。这意味着国有、非国有企业通过公益性捐赠获得“清洁”

^①《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规定,重污染行业包括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化工、石化、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具体按照2008年《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认定。

审计意见的概率没有实质性的差异。M2 引入环境污染(*pollution*)及其与公益性捐赠交乘项(*pollu_lndonation*)来验证假说2,结果显示公益性捐赠的回归系数为3.133,在5%统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环境污染与公益性捐赠的交乘项(*pollu_lndonation*)回归系数为-2.042,在10%统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相比于非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的公益性捐赠获得“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相对较低,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假说2。我们进一步按照产权性质进行分组,结果表明,国有、非国有企业的环境污染对其公益性捐赠与“清洁”审计意见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没有实质性的差异。

表2 回归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最小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大值
<i>op</i>	9960	0	0.9438	1	0.2304	1
<i>lndonation</i>	9960	0	1.444	0	4.226	15.36
<i>pollution</i>	9960	0	0.4199	0	0.4936	1
<i>roe</i>	9960	-0.3547	0.0637	0.0655	0.1034	0.2745
<i>Q</i>	9960	0.9152	2.23	1.737	1.42	9.29
<i>lev</i>	9960	0.3144	1.449	1.129	0.8991	4.663
<i>lnsize</i>	9960	19.76	22.21	22.1	1.271	25.21
<i>dual</i>	9960	0	0.8614	1	0.3455	1
<i>idr</i>	9960	0.3333	0.3672	0.3333	0.0456	0.5
<i>lnsalary</i>	9960	11.47	13.75	13.82	0.8787	15.48
<i>opl</i>	9960	0	0.9435	1	0.2309	1
<i>aufirme</i>	9960	0	0.1971	0	0.3978	1
<i>soe</i>	9960	0	0.6182	1	0.4859	1

表3 回归模型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i>op</i>	<i>lndonation</i>	<i>pollution</i>	<i>lnsalary</i>	<i>opl</i>	<i>roe</i>	<i>lnsize</i>
<i>op</i>	1	0.0753 *	0.0045	0.1733 *	0.6367 *	0.1168 *	0.2249 *
<i>lndonation</i>	0.0750 *	1	0.0532 *	0.1988 *	0.0744 *	0.1455 *	0.3180 *
<i>pollution</i>	0.0045	0.0533 *	1	-0.0981 *	0.0188	-0.0579 *	0.0603 *
<i>lnsalary</i>	0.1816 *	0.1938 *	0.0659 *	1	0.1712 *	0.2881 *	0.4200 *
<i>opl</i>	0.6367 *	0.0742 *	0.0188 *	0.1786 *	1	0.0462 *	0.2238 *
<i>roe</i>	0.1557 *	0.1292 *	-0.0522 *	0.2536 *	0.0702 *	1	0.1984 *
<i>lnsize</i>	0.2304 *	0.3428 *	0.0659 *	0.4120	0.2295	0.1749 *	1

注:以对角线进行划分,左下角为pearson相关系数,右上角为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表示双尾检验10%、5%和1%的统计显著性水平。

表4 环境污染、公益性捐赠与“清洁”审计意见 Logistic 多元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M1			M2		
	全样本	国有	非国有	全样本	国有	非国有
<i>lndonation</i>	1.129 *	1.366	0.866	3.133 **	2.998	5.649
	(1.83)	(1.47)	(1.05)	(2.08)	(1.55)	(0.92)
<i>pollution</i>				-0.168	-0.345	-0.026
				(-0.64)	(-0.82)	(-0.08)
<i>pollu_lndonation</i>				-2.042 *	-1.720	-3.767
				(-1.75)	(-1.05)	(-0.98)
<i>soe</i>	0.020			0.025		
	(0.08)			(0.09)		
<i>Q</i>	-1.065 ***	-0.952 **	-1.049 ***	-1.063 ***	-0.966 ***	-1.049 ***
	(-4.49)	(-2.55)	(-3.49)	(-4.49)	(-2.59)	(-3.48)
<i>lev</i>	-0.102	-0.192	-0.023	-0.085	-0.164	-0.017
	(-0.42)	(-0.50)	(-0.08)	(-0.35)	(-0.43)	(-0.06)
<i>lnsize</i>	1.651 ***	1.739 ***	1.645 ***	1.662 ***	1.763 ***	1.651 ***
	(4.18)	(2.96)	(3.10)	(4.19)	(2.99)	(3.11)
<i>dual</i>	0.149	0.006	0.155	0.152	0.017	0.160
	(0.63)	(0.01)	(0.52)	(0.64)	(0.04)	(0.53)
<i>idr</i>	0.178	0.165	0.180	0.157	0.162	0.154
	(0.67)	(0.38)	(0.57)	(0.59)	(0.38)	(0.48)
<i>lnsalary</i>	1.027 ***	1.290 ***	0.802 **	1.023 ***	1.270 ***	0.812 **
	(3.54)	(2.79)	(2.20)	(3.50)	(2.73)	(2.22)
<i>opl</i>	4.085 ***	4.226 ***	3.910 ***	4.097 ***	4.248 ***	3.917 ***
	(31.67)	(23.49)	(21.13)	(31.63)	(23.44)	(21.10)
<i>aufirme</i>	-0.245	0.185	-0.539 **	-0.249	0.183	-0.553 **
	(-1.05)	(0.48)	(-1.97)	(-1.06)	(0.47)	(-2.01)
<i>N</i>	9960	6157	3803	9960	6157	3803
<i>Pseudo R</i> ²	0.4663	0.4351	0.4883	0.4674	0.4362	0.4905

注:圆括号内的数值为双尾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显著,下同。

六、稳健性检验

(一) 去除异常年份的稳健性检验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社会捐赠达到 1000 亿,是过去十年的总和。巨大灾难引发海内外空前的慈善高潮,本土企业也纷纷以巨额捐助践行“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观念。杜兴强和杜颖洁认为,突发性的自然灾害事件往往催生企业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企业将会比平常更加慷慨解囊^[7]。因此,2008 年属于我国企业捐赠行为较为特殊的异常年份。表 5 报告了剔除 2008 年数据后的 Logistic 多元回归结果,检验结果与前文一致。

表 5 剔除异常年份数据的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M1			M2		
	全样本	国有	非国有	全样本	国有	非国有
lndonation	1.321 ** (1.99)	1.613 (1.61)	0.962 (1.09)	3.479 ** (2.15)	3.430 (1.64)	6.059 (0.91)
pollution				-0.186 (-0.65)	-0.422 (-0.91)	0.038 (0.11)
pollu_lndonation				-2.193 * (-1.74)	-1.912 (-1.08)	-4.018 (-0.96)
soe	-0.078 (-0.27)			-0.074 (-0.25)		
roe	1.934 *** (8.92)	2.050 *** (5.96)	1.735 *** (6.34)	1.935 *** (8.91)	2.050 *** (5.95)	1.724 *** (6.31)
Q	-1.132 *** (-4.16)	-0.668 (-1.53)	-1.313 *** (-3.80)	-1.132 *** (-4.16)	-0.693 (-1.59)	-1.311 *** (-3.79)
lev	-0.155 (-0.60)	-0.010 (-0.02)	-0.248 (-0.80)	-0.134 (-0.52)	0.022 (0.05)	-0.241 (-0.78)
lnsize	1.409 *** (3.24)	1.674 ** (2.56)	1.347 ** (2.31)	1.418 *** (3.25)	1.698 *** (2.59)	1.350 ** (2.31)
dual	0.133 (0.51)	-0.096 (-0.23)	0.162 (0.49)	0.138 (0.53)	-0.073 (-0.17)	0.174 (0.53)
idr	0.182 (0.63)	0.098 (0.21)	0.236 (0.68)	0.158 (0.55)	0.092 (0.20)	0.210 (0.60)
lnsalary	1.189 *** (3.81)	1.734 *** (3.51)	0.810 ** (2.05)	1.183 *** (3.75)	1.696 *** (3.38)	0.826 ** (2.08)
opl	4.140 *** (29.85)	4.285 *** (22.21)	3.980 *** (19.88)	4.153 *** (29.82)	4.309 *** (22.16)	3.988 *** (19.85)
aufirmc	-0.045 (-0.18)	0.291 (0.69)	-0.270 (-0.89)	-0.049 (-0.19)	0.285 (0.67)	-0.285 (-0.94)
N	8790	5352	3438	8790	5352	3438
Pseudo R ²	0.4707	0.4427	0.4918	0.4720	0.4441	0.4943

(二) 替换企业公益性捐赠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1. 我们采用企业是否进行公益性捐赠(*dond*),代替前文的企业公益性捐赠额的自然对数值(ln*donation*),检验环境污染、公益性捐赠与“清洁”审计意见三者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与前文一致,详见表 6,这表明前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2. 我们采用企业公益性捐赠规模(*d*),即 ln*donation*/ln*size* 为企业公益性捐赠的测量指标,代替前文的企业公益性捐赠额的自然对数值,检验环境污染、公益性捐赠与“清洁”审计意见三者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与前文一致,详见表 7,这表明前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三)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文章可能存在异方差、自相关及遗漏变量等问题,本文采取面板数据模型检验环境污染、公益性捐赠与“清洁”审计意见三者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与前文一致,详见表 8,这表明前文的结论是稳健的^①。

^①稳健的 OLS(OLS_robust):如果发现存在异方差,一种处理方法是仍然进行 OLS 回归,但使用稳健标准误,这是最简单也是目前通用的方法,在这里作为参考对象。随机效应(RE):同一个体不同时期的扰动项之间的自相关系数不随时间距离而改变,因此其模型也称为“可交换扰动项模型”。组间估计量(BE):如果每位个体的时间序列数据较不准确或噪音较大,可对每位个体取时间平均值,然后用平均值回归。

表6 替换公益性捐赠测度变量的稳健性检验1:是否进行公益性捐赠

解释变量	M1			M2		
	全样本	国有	非国有	全样本	国有	非国有
dond	1.066 [*] (1.85)	1.155 (1.37)	0.976 (1.18)	3.120 ** (2.14)	3.024 (1.62)	14.440 (0.03)
pollution				-0.161 (-0.61)	-0.325 (-0.77)	-0.029 (-0.09)
pollu_dond				-2.114 * (-1.84)	-1.958 (-1.24)	-9.365 (-0.03)
soe	0.016 (0.06)			0.020 (0.08)		
Q	-1.064 *** (-4.49)	-0.947 ** (-2.54)	-1.049 *** (-3.49)	-1.060 *** (-4.47)	-0.956 ** (-2.57)	-1.049 *** (-3.48)
lev	-0.102 (-0.42)	-0.194 (-0.51)	-0.021 (-0.07)	-0.086 (-0.36)	-0.164 (-0.43)	-0.020 (-0.07)
lnsize	1.650 *** (4.18)	1.755 *** (2.98)	1.632 *** (3.08)	1.669 *** (4.21)	1.785 *** (3.02)	1.642 *** (3.09)
dual	0.150 (0.63)	0.006 (0.01)	0.155 (0.52)	0.154 (0.65)	0.021 (0.05)	0.159 (0.53)
idr	0.179 (0.68)	0.169 (0.39)	0.178 (0.56)	0.158 (0.60)	0.166 (0.39)	0.153 (0.48)
lnsalary	1.028 *** (3.55)	1.289 *** (2.79)	0.803 ** (2.20)	1.024 *** (3.51)	1.272 *** (2.73)	0.815 ** (2.22)
opl	4.082 *** (31.65)	4.223 *** (23.47)	3.909 *** (21.12)	4.094 *** (31.61)	4.246 *** (23.42)	3.911 *** (21.10)
aufirme	-0.249 (-1.06)	0.178 (0.46)	-0.540 ** (-1.97)	-0.252 (-1.08)	0.177 (0.45)	-0.555 ** (-2.02)
N	9960	6157	3803	9960	6157	3803
Pseudo R ²	0.4663	0.4349	0.4885	0.4676	0.4363	0.4906

表7 替换公益性捐赠规模测度变量的稳健性检验2:公益性捐赠规模

解释变量	M1			M2		
	全样本	国有	非国有	全样本	国有	非国有
d	1.105 [*] (1.86)	1.229 (1.42)	0.974 (1.15)	3.000 ** (2.10)	2.786 (1.55)	18.663 (0.02)
pollution				-0.168 (-0.64)	-0.341 (-0.80)	-0.028 (-0.09)
pollu_d				-1.977 * (-1.74)	-1.673 (-1.07)	-12.020 (-0.02)
soe	0.017 (0.06)			0.020 (0.08)		
roe	2.044 *** (10.41)	2.398 *** (7.71)	1.672 *** (6.79)	2.041 *** (10.39)	2.395 *** (7.69)	1.662 *** (6.76)
Q	-1.065 *** (-4.49)	-0.950 ** (-2.55)	-1.049 *** (-3.49)	-1.062 *** (-4.48)	-0.961 *** (-2.58)	-1.049 *** (-3.48)
lev	-0.101 (-0.42)	-0.192 (-0.50)	-0.021 (-0.07)	-0.086 (-0.36)	-0.165 (-0.43)	-0.020 (-0.07)
lnsize	1.648 *** (4.17)	1.746 *** (2.96)	1.637 *** (3.09)	1.666 *** (4.20)	1.775 *** (3.01)	1.642 *** (3.09)
dual	0.149 (0.63)	0.004 (0.01)	0.155 (0.52)	0.152 (0.64)	0.014 (0.04)	0.159 (0.53)
idr	0.180 (0.68)	0.170 (0.39)	0.179 (0.57)	0.160 (0.61)	0.169 (0.39)	0.153 (0.48)
lnsalary	1.027 *** (3.54)	1.288 *** (2.79)	0.802 ** (2.20)	1.021 *** (3.50)	1.267 *** (2.72)	0.815 ** (2.22)
opl	4.082 *** (31.65)	4.223 *** (23.47)	3.908 *** (21.12)	4.093 *** (31.61)	4.244 *** (23.42)	3.911 *** (21.10)
aufirme	-0.248 (-1.06)	0.179 (0.46)	-0.539 ** (-1.97)	-0.251 (-1.07)	0.177 (0.45)	-0.555 ** (-2.02)
N	9960	6157	3803	9960	6157	3803
Pseudo R ²	0.4663	0.4350	0.4885	0.4674	0.4361	0.4906

(四) 控制逆米尔斯比率(invrmr)的稳健性检验

为缓解样本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性,本文稳健性检验的回归模型当中控制了逆米尔斯比率^①。

①逆米尔斯比率=公益性捐赠拟合值的标准正态分布密度/累计标准正态分布。

计算逆米尔斯比率的 Probit 回归模型如下。

$$dond = w_0 + w_1 Q + w_2 lev + w_3 lnsiz + \\ w_4 lnslary + w_5 roe + \tau$$

我们将逆米尔斯比率作为控制变量代入如下“清洁”审计意见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

$$op = \chi_0 + \chi_1 dond + \chi_2 lnsiz + \chi_3 lev + \chi_4 roe + \\ \chi_5 idr + \chi_6 lnslary + \chi_7 opl + \chi_8 dual + \chi_9 Q + \\ \chi_{10} aufirmc + \chi_{11} soe + \chi_{12} invmr + \nu$$

$$op = \gamma_0 + \gamma_1 dond + \gamma_2 pollution + \\ \gamma_3 pollution_dond + \gamma_4 lnsiz + \gamma_5 lev + \gamma_6 roe + \\ \gamma_7 idr + \gamma_8 lnslary + \gamma_9 opl + \gamma_{10} dual + \gamma_{11} Q + \\ \gamma_{12} aufirmc + \gamma_{13} soe + \gamma_{14} invmr + \theta$$

控制样本选择偏差的环境污染、公益性捐赠与“清洁”审计意见的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与前文结论一致。

表 8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1)	(2)	(3)
	OLS_robust	RE	BE
Indonation	3.186 ** (2.22)	3.261 ** (2.21)	3.261 ** (2.10)
pollu_Indonation	-2.121 * (-1.88)	-2.228 * (-1.92)	-2.228 * (-1.87)
roe	2.048 *** (9.01)	2.018 *** (8.58)	2.018 *** (9.92)
Q	-1.061 *** (-4.60)	-1.081 *** (-4.55)	-1.081 *** (-4.38)
lev	-0.089 (-0.33)	-0.054 (-0.19)	-0.054 (-0.22)
lnsize	1.640 *** (3.84)	1.858 *** (3.90)	1.858 *** (4.27)
dual	0.159 (0.65)	0.189 (0.74)	0.189 (0.76)
idr	0.165 (0.63)	0.150 (0.55)	0.150 (0.53)
lnslary	1.042 *** (3.53)	1.141 *** (3.70)	1.141 *** (3.66)
opl	4.094 *** (28.76)	3.952 *** (22.74)	3.952 *** (25.21)
aufirmc	-0.248 (-1.00)	-0.268 (-1.05)	-0.268 (-1.11)
soe	0.032 (0.11)	0.016 (0.05)	0.016 (0.06)
N	9960	9960	9960
Pseudo R ²	0.4673		

表 9 控制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M3	M4		M5			
	Probit 回归	全样本	国有	非国有	全样本	国有	非国有
dond		1.059 * (1.82)	1.171 (1.38)	0.956 (1.15)	3.116 ** (2.14)	3.029 (1.63)	16.284 (0.01)
pollution					-0.160 (-0.61)	-0.327 (-0.77)	-0.026 (-0.08)
pollu_dond					-2.119 * (-1.84)	-1.949 (-1.24)	-10.559 (-0.01)
soe		0.017 (0.06)			0.022 (0.08)		
roe	0.000 *** (6.86)	2.300 (0.92)	1.830 (0.52)	2.728 (0.69)	2.390 (0.94)	1.877 (0.53)	2.797 (0.70)
Q	0.026 ** (2.23)	-0.969 (-1.01)	-1.119 (-0.99)	-0.587 (-0.34)	-0.931 (-0.96)	-1.113 (-0.98)	-0.552 (-0.31)
lev	0.004 *** (-2.91)	-0.201 (-0.20)	0.040 (0.03)	-0.390 (-0.28)	-0.221 (-0.22)	0.049 (0.03)	-0.416 (-0.29)
lnsize	0.000 *** (25.02)	2.599 (0.28)	-0.351 (-0.03)	5.400 (0.38)	2.963 (0.32)	-0.140 (-0.01)	5.696 (0.40)
dual		0.150 (0.64)	0.005 (0.01)	0.158 (0.53)	0.155 (0.65)	0.020 (0.05)	0.162 (0.54)
idr		0.179 (0.68)	0.172 (0.40)	0.179 (0.57)	0.157 (0.59)	0.169 (0.39)	0.154 (0.48)
lnslary	0.000 *** (4.44)	1.179 (0.78)	0.958 (0.46)	1.434 (0.60)	1.230 (0.81)	0.969 (0.46)	1.494 (0.62)
opl		4.082 *** (31.64)	4.225 *** (23.42)	3.909 *** (21.13)	4.094 *** (31.60)	4.247 *** (23.38)	3.911 *** (21.10)
aufirmc		-0.248 (-1.06)	0.178 (0.46)	-0.540 ** (-1.97)	-0.252 (-1.08)	0.178 (0.46)	-0.555 ** (-2.02)
invmr		1.020 (0.10)	-2.266 (-0.16)	4.159 (0.27)	1.392 (0.14)	-2.071 (-0.15)	4.474 (0.28)
N	9960	9960	6157	3803	9960	6157	3803
Pseudo R ²	0.1816	0.4663	0.4350	0.4886	0.4676	0.4363	0.4907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选取我国2008—2015年间沪深A股公司年度观察值作为研究对象,采用Logistic多元回归方法,探索了环境污染、公益性捐赠与“清洁”审计意见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与效应,结论如下:(1)公益性捐赠能够提高审计师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2)相比于非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的公益性捐赠获得“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相对较低;(3)国有、非国有企业的公益性捐赠获得“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没有实质性差异。结合现阶段我国的实际经济状况,本文有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现代企业应当统筹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我国企业目前普遍存在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冲突,亟待缓解与治理。本文发现,公益性捐赠能够提高审计师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这意味着,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通过公益性捐赠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可以赢得包括审计师在内的社会利益相关群体的肯定与支持,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协调与统一。

第二,走“绿色”与“清洁”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本文发现,重污染企业的公益性捐赠获得“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相对较低,这意味着,进行公益性捐赠虽可以起到一定的伤害保险作用,但重污染企业相对于环境友好型企业,试图通过公益性捐赠来获得包括审计师在内的社会利益相关群体的同等肯定与支持,是不现实的。企业通过持续创新推动转型升级,倡导“绿色”生产,借助节能减排降低环境污染,倡行“清洁”生产,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应是本文题中之意。

第三,充分发挥政府的助推作用。本文发现,国有、非国有企业的公益性捐赠获得“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没有实质性差异,这意味着,政府在企业公益性捐赠实践中大有可为。毋庸讳言,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履行需要政府的引导与推动。通过改革,进一步厘清企业公益性捐赠实践中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角色担当。本文认为,政府充分发挥其应尽职能,通过加大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贷款力度,鼓励和引导企业积极进行公益性捐赠,可以激发企业、公民社会责任正能量;通过健全、完善我国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可以为企业公益性捐赠的道义行为提供强有力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 [1] 钟宏武.企业捐赠作用的综合解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7(2):77-85.
- [2] 韩丽荣,高瑜彬,盛金,孔祥雪.注册会计师是否关注了环境事项?——来自中国沪市重污染行业的经验证据[J].当代会计评论,2011(2):37-53.
- [3] 韩文才,汤琦瑾.公司社会责任对审计收费与审计意见影响的实证研究[J].新疆财经,2013(5):30-38.
- [4] 迟爱敏,张东玲.企业捐赠: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J].企业经济,2010(11):151-153.
- [5] Navarro P. Why do corporations give to charity? [J].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1988, 61(1):65-93.
- [6] Brammer S, Millington A. Corporate reputation and philanthropy: an empir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5, 61(1):29-44.
- [7] 杜兴强,杜颖洁.公益性捐赠、会计业绩与市场绩效:基于汶川大地震的经验证据[J].当代财经,2010(2):113-122.
- [8] 李诗田,宋献中.声誉机制、代理冲突与企业捐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经济经纬,2014(4):92-97.
- [9] Windsor 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a theory of the firm perspective:some comments[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1, 26(4):502-504.
- [10] 牛海鹏,朱松.企业捐赠、市场认知与盈余信息含量[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4):84-94.
- [11] DeAgelo. Auditor size and audit qualit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1, 3(3):183-199.
- [12] Palmrose Z V. An analysis of auditor litigation and audit service quality[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88, 63(1):55-73.
- [13] 吴腊.我国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意见影响因素研究[J].财会通讯,2014(36):28-33.
- [14] 李歆,左燕.盈余管理风险、终极产权与审计意见[J].财会月刊,2016(2):88-93.
- [15] 李嘉明,杨帆.对外担保会影响审计费用与审计意见吗? [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6(1):27-37.
- [16] Campbell J L. Why would corporations behave in socially responsible ways?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A-

- 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7,32(3):946–967.
- [17] Schwartz R A. Corporate philanthropic contributions[J]. The Journal of Finance,1968,23(3):479–497.
- [18] 张同龙.企业捐赠的动机考察:自利,还是利他? [J].制度经济学研究,2011(2):28–41.
- [19] 李胜楠,曹思霞,刘一璇.论企业捐赠的“真实身份”——企业捐赠研究述评[J].管理现代化,2015,35(4):127–129.
- [20] Godfrey P 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d shareholder wealth:a risk management perspectiv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5,30(4):777–798.
- [21] 高勇强,陈亚静,张云均.“红领巾”还是“绿领巾”: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研究[J].管理世界,2012(8):106–114,146.
- [22] 薄仙慧,吴联生.盈余管理、信息风险与审计意见[J].审计研究,2011(1):90–97.
- [23] Fombru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orporate reputations[D].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1996.
- [24] 郑志刚,李东旭,许荣,等.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与形象工程——基于N省A公司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12(10):146–156,188.
- [25] 陈丽蓉,潘芹.审计意见影响因素研究综述与启示[J].会计之友,2010(26):68–70.
- [26] 江炎骏.企业捐赠动机的文献综述[J].中外企业家,2014(22):192–194,198.
- [27] 郭丽娜.重污染行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D].哈尔滨商业大学,2015.
- [28] 蔡春,杨麟,陈晓媛,等.上市公司审计意见类型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沪深股市2003年A股年报资料的研究[J].财经科学,2005(1):95–102.
- [29] 李东平,黄德华,王振林.“不清洁”审计意见、盈余管理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J].会计研究,2001(6):51–82.
- [30] 李伟.不确定性环境下会计稳健性对审计收费、审计意见的影响[J].审计研究,2015(1):91–98.

[责任编辑:刘茜]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haritable Donation and “Clean” Audit Opin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A-share Market

WU Lianghai¹, ZHANG Yu¹, LV Danli¹, XIE Zhihua²

(1. S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32,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Is the auditor's audit opinion influenced by the enterprise charitable don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A-share market data. Choosing 9960 listed companies data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market from 2008 to 2015 as a research sample, and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haritable donation and “clean” audit opin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enterprises' charitable donation can enhance the probability of “clean” audit opinion. (2) and then we divide the sample by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mpared to the non-polluting enterprises, the probability of “clean” audit opinion of the charitable donation of the heavy pollution enterprise is relatively lower. (3) the results of following test in which we divide the sample by ownership type of enterprise show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robability of obtaining “clean” audit opinion between state-owned and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haritable donation; “clean” audit opinion; ownership type; ESR; audit fee; earnings management; audit risk